

浩然——我的启蒙老师

肖文奎

我和浩然是从 1960 年认识的，他比我大一岁，1932 年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，1946 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先后当过基层干部、《河北日报》《友好报》《红旗》杂志社记者、编辑等。我对他的称呼是浩然兄，他总叫我文奎弟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
我和他是通过原《红旗》杂志社，即现在的《求是》文艺组组长郑公盾介绍认识的。那时，浩然刚从河北日报社调到《红旗》杂志社不久，

1959 年原《红旗》杂志社的郑公盾在我们公社大韩继村下放劳动，当时他任组长，半年后调到周口店管理区，（后改名公社）任副书记，分管党建、党群工作。我当时做组织工作，我们之间相互配合得很好，关系自然就很密切。

1961 年周口店管理区改为周口店公社，他下放劳动期满回原单位工作。从此，《红旗》杂志社文艺组与周口店公社结下了友谊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并把周口店公社做为他们的联络点。浩然就成了《红旗》杂志社文艺组与公社之间的联络员。从此我和浩然结下了友谊，成了好朋友。

他一有时间就来公社住几天，我的办公室为他预备一张床铺。他一来就和我住在一起，我陪他一起下乡，一起劳动，一起采访，一起吃饭，成了铁关系。他既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的写作的老师。

浩然日采夜写，谈吐幽默。为了采访，常常忘了吃饭，就到我家吃。有一次我们到南韩继村采访完了，午饭过了，晚饭还不到时候，只好到我家去吃了，老伴去生产队里劳动，我俩便动起手，他把锅坐在了火炉上，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碗玉米糝和一把红小豆拿了出来，熬起了玉米豆儿粥。玉米糝下锅后，我俩便聊起来如何采访，他教我如何写作，越说越起劲，越聊越高兴，把火上坐着的粥锅给忘到脑后头了，等粥的糊味儿出来才想起了粥锅。这时，我两个是张飞看刺猬——大眼瞪小眼啦。浩然风趣的说：“这粥是他二婶熬的，跟别人熬的不一个味”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这粥糊香儿糊香儿的”。他的风趣、幽默，使我也笑了。我俩只好将就着吃了，他边吃边笑地说：“这种味道，北京饭店都买不到，他们根本就没这手艺”。我被他说的哈哈大笑。

一次，到周口村第三生产队采访打大口儿井。那时为了抗旱，各村都开展人工打大口儿井，所谓大口儿井就是指井的直径，一般都是三米，用人工往下挖，直到挖见了水能够供 4—6 寸的水泵抽水为止。

挖大口儿井十分危险，因为地层复杂，一般的都是经过黄土层、沙土层、河卵石、河沙四次，有的还会遇到岩石，需要打眼放炮，操作时必须边挖边撑

盘。这是一项危险性大、技术性强的工作。当时，周口村第三生产队的这口井正挖在沙层上，因撑盘稍晚一点，四周井壁的沙子直往下流，随时有坍塌的可能，挖掘人员的生命随时有危险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生产队长、共产党员魏广孝把井下两个作业人员叫了上来，他却向井下冲了下去，大伙都阻拦他下井。他对大家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又是队长，我不下井谁下井？这时候往后退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，什么干部呀，今后我怎么见人，快！时间不能再耽误了，再晚了这口井就完了。”井上人只好把他小心地送下井，我和浩然正在现场，被这感人的情景吸引住啦，非常替他担心。我和浩然在上面井沿边探着头看他作业，只见他手拿斧子，就听乒乒乓乓的响声，仅用两分多钟的时间，五根撑盘的木头，根根砍出了标准的撑盘口，然后又抱起两抱树枝，三下五除二，不到五分钟的工夫，一个结实又标准的木盘撑好啦，河沙不再流，险情被排除。这时井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作业人员把魏广孝队长从井下提了上来，他露出了满意的的笑容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没事啦，大家放心的干吧！”打井的社员又高高兴兴地干了起来。

晚上，回到办公室，谈完了一天所见、所闻的体会后，已到夜里一点多钟了。他见我有点倦意，对我说：“文奎弟，你先睡吧，我稍晚一点再睡。”一天下乡走路较多，去的地方和采访、座谈也多，我确实感觉有点累，十分钟后我就入睡了。他愣是把我们白天看到魏广孝队长的事迹，写了一篇题为《冲锋陷阵的队长魏广孝》的通讯才入睡，此稿第三天发表在《北京晚报》上。

浩然有一种让人钦佩的热心助人的好品德。我是小学没毕业，以前根本就不能写东西，但我的工作性质需要我写一些材料，所以，非常吃力，每次写总结，工作计划等都要去求人帮忙，为这事我很烦恼，曾经要求领导为我调换工作，他发现我的畏难情绪，就主动帮助我。

开始，我信心不大，他就用自己的经历，苦口婆心的启发我，帮助我，提高我的信心。他对我说：“毛主席告诉我们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干什么都一样，只要你跟他较上劲，就没有干不成的。我比你高不了多少，我就是小学毕业，开始比你还困难，但我不灰心，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东西，退回来的稿件摞起来有一米多高，后来我终于成功了。所以见困难就低头什么也干不成。”他的耐心启发，使我信心大增，我写总结、汇报等基本不再求人。

我开始写报道时，浩然主动帮我修改。起初是先看，后指导，他指导的非常细，就连标点符号都说得清清楚楚。他指点后我开始写出稿件，他再亲自为我修改。这样，一遍又一遍地，不厌其烦的帮我修改，我终于能写一些报道了，在他的耐心帮助下，我曾为《北京日报》郊区版写过《南韩继大搞积肥活动，夺取农业更大丰收》的报道。给《北京晚报》写过《带头队长魏广孝》原《时事手册》刊登过我写的《南韩继科学种田，提高粮食产量》的文章，之后我被这些单位和房山县广播站聘任为通讯员。

浩然不仅热情，而且非常严格。有一次我为《北京日报》郊区版写了《南韩继大搞积肥，夺取农业更大丰收》的报道，每亩地施肥一万斤，我用了阿拉

伯字母，小数点点错了位。他审查时发现了，对我进行了既严肃又耐心的批评帮助。他说：“文奎弟：写东西可不是用镐招地头，深点浅点无所谓，一镐下去再用镐头一蹿，表面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写东西可不一样，一个标点，一个字都不能马虎。”经他一指点，我深知用笔写文章如同打仗，稍一马虎，就失去了战机，铸成大错。后来，我不管写什么都要认真检查三、四遍才放心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“极左”路线的影响，他曾遭到造反派的冲击，受到多次批判，落下不少毛病。不管怎么批判，他平易近人，实事求是，歌颂工农，热爱基层，热爱群众，助人为乐的品质一点没变。

1992年，我曾去过三河县看过他一次，那时他帮助三河县创办了一个《苍生报告文学》刊物，这个刊物面向全国，很受读者欢迎。我俩见面后，由于长时间未见，他的高兴劲我无法形容，长时间拉着我的手不放。当时他曾答应我在适当的时候帮我们周口店办一小型刊物，他任名誉主编。由于他和他的老伴身体欠佳，他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。1994年我退休后一直没有联系。两年前，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他去逝的消息，非常难过，至今一提起浩然眼就情不自禁地红起来。

浩然与世长辞了，但他那密切联系群众，实事求是，助人为乐，走基层，歌颂工农，平易近人，严肃认真的好品德，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。他的精神，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进。